

DOI: 10.13253/j.cnki.ddjgl.2016.09.015

中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风险来源及防范机制

◆ 聂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00)

[摘要] “一带一路”的建设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新的市场机遇的同时, 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通过对“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和整理, 将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分为两大类: 外部环境风险与企业内部经营风险。外部环境风险类型主要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与文化风险, 企业内部经营风险主要为决策风险、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基于上述的风险类型划分, 文章对相关的风险管理理论进行了梳理, 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分类风险治理措施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对外投资; 风险分布; 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 F830.5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6)09-0084-07

一、引言

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后, 其对外投资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一带一路”战略的部署实施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市场机遇的同时, 也为中国对外投资带来了风险。如何能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海外投资过程中的各种风险, 是中国面向“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主要组成力量, 涵盖了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经相关统计部门测算, 这些地区的人口规模约为 44 亿, 约占全球人口总量的 63%; 其经济总量约为 21 万亿美元, 约占全球总量的 29%, 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绝大多数依赖于境外投资和贸易, 是目前全球贸易和境外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截止 2014 年末,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 856.8 亿美元, 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11% (见表 1);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

《2014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相关内容显示: “2015 年 1~7 月,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48 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合计 85.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9.5%, 直接投资总额约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 13.5%, 投资目的国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尼、老挝、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泰国等。”从投资行业的分布情况来看, 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分布较为集中, 主要涉及建筑业、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传统行业, 显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这也意味着未来我国的对外投资将呈现新的格局。

“一带一路”建设在赋予我国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 其面临的投资风险也与日俱增。2011 年 9 月, 中国在缅甸计划投资 36 亿美元的密松大坝由于环境保护等原因被迫叫停; 2013 年 10 月, 中国与泰国签署了泰国高速公路的项目建设协议, 其后由于英拉政府遭遇政变, 该项目随即陷入僵

表 1 2004~2014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存量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沿线地区/亿美元	19.5	34.1	52.7	97.3	149.8	8.2	292.5	416.8	567.6	720.2	856.8
世界/亿美元	447.8	272.1	750.3	1 179.1	1 839.7	2 457.6	3 172.1	4 247.8	5 319.4	6 604.8	8 826.4
沿线地区比重%	4.4	12.5	7	8.3	8.1	8.2	9.2	9.8	10.7	10.9	11

数据来源: 2003~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商务部等相关统计数据测算所得。

收稿日期: 2016-06-23

网络出版网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60906.1301.015.html> 网络出版时间: 2016-9-6 13:01:24

作者简介: 聂娜 (1985-), 女, 山西临汾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与投资、国际知识产权经济。

局。2014年10月，中国铁建的733亿美元高铁合同，被墨西哥政府以油价暴跌为由宣布无限期推迟；2015年1月，我国在希腊的9.5亿美元港口私有化项目因左翼联盟党的上台陷入困境；同月，斯里兰卡宣布对我国投资15亿美元开发的科伦坡港口重新评估。以上案例在我国面向“一带一路”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屡见不鲜，为我国的投资前景蒙上了阴影。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以及当前经济发展深化调整的过程来看，未来中国面向“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规模与数量将会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因此，正确全面的了解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现状和能清楚的认识风险，并建构相应的对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是健全和完善面向“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前提和关键，也是适应中国对外投资新战略的必然要求。

当前，国内关于“一带一路”投资风险治理的文献不多，研究的视角多集中于“一带一路”建设投资风险的种类、表现及对策的相关研究。对于“一带一路”境外投资风险的种类，蒋姮（2015）认为地缘政治风险形式的多样化是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最突出的风险因子；王卫星（2015）认为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风险主要有五种：安全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社会风险等等。在投资风险的对策和治理分析层面上，谭畅（2015）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活动中应充分考虑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同时在国际上营造积极舆论，为海外投资创造安全稳定的投资条件。郑钧天（2015）提出中国企业在面向“一带一路”投资时要有全球规则意识，在投资领域和制度层面做好风险防范。马钧（2015）指出要切实管控投资风险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先重后轻”的原则；“先易后难”的原则；“分层分类”的原则。从上述文献研究的内容可知，尽管现有的文献研究对风险种类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对风险的后果、治理也有不同视角的总结，但是在相应的政策建议方面缺乏理论基础。据此可知，“一带一路”风险治理机制的分析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系统性与可操作性均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本文拟对“一带一路”境外投资风险管理这一问题，以我国参与“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现状和风险现状的梳理为出发点，运用归纳总结、文献研究等方法分析其所面临的风险类别，通过对政治风险理论、传统风险管理（保险）理论、投资分散理论等相关理论的整理，来探讨“一带一路”境外投资风险的防范

机制，以期从理论研究的视角为对外投资风险防范管理对策找到合理的解释。

二、中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风险来源及其分布

本文从宏观管理的角度对“一带一路”投资风险进行研究，将以风险的来源为着眼点进行分类。基于这个分类标准，本文将境外投资风险分为两类：外部投资环境风险与企业内部投资风险。

（一）外部投资环境风险

由于境外投资的东道国投资环境差异性较大，因此，在面向“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过程中主要的风险类型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

1. 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由于投资所在地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而给投资企业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构成政治风险的因素较多，而其中对境外投资影响最大的政治风险通常包括政局动荡、内乱及战争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

（1）政局动荡、战争和内乱风险：“一带一路”沿线途径中亚、中东、东南亚等区域，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影响较为严重和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国家国内政治环境复杂，由国家内部的不同利益冲突所引发的政局动荡、政策变更和官员腐败行为使对外投资增加了投资成本和风险。例如：2011年利比亚发生内战，使得我国在利比亚进行投资建设的企业遭受了重创。据统计，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包的工程涉及金额多达188亿美元，在此次战争期间，其相关的设备、基地等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损失巨大。

（2）国家安全冲突风险：国家安全冲突风险主要是指我国发起的“一带一路”战略与东道国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导致的风险。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东道国出于国家利益及国家安全的动机可能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项目进行诸多限制和干涉，进而阻碍“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而这类风险一般体现在政府进行明显限制的直接风险和通过法律、经济等手段间接实施的隐形风险。因此化解和防范因战略冲突等因素引起的风险也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所需要认真考量的因素。

2. 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是指企业在境外进行投资活动的过程中，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周期的波动、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调整而使得企业的投资收益收到影响的可能性。根据“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的经济现状，本文将所面临的主要经济风险划分为汇

率风险、衍生品交易风险、信用风险。

(1) 汇率风险：汇率风险是指由于汇率的波动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的经济损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欠发达国家，不仅汇率的波动较大，而且各国的汇率制度差异也很大。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将本地货币汇兑为美元，然后再按照国内的汇率将美元结汇为人民币，因而就产生了双重汇率风险。因此，境外投资中企业以美元等其他货币进行计算的资产与负债的增加和减少都会给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外投资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

(2) 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 71 家证券、期货交易所，其中期货交易所 22 家、证券交易所 41 家、期货及证券综合性交易所 8 家，但部分沿线国家依然存在没有交易所的现象。充分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期货市场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尽管衍生品市场未来的交易量潜力巨大，但是由于沿线国家在产以及交易场所方面尚不具备竞争力，难以满足境外企业的风险管理需求。

(3) 信用风险：在当前世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世界经济低迷的经济环境下，部分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由于存在着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和较为薄弱的经济基础，其内部的产业结构性矛盾、出口导向型经济持续萎缩等问题日益凸现，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较高，但其本身的抵御资本外流的能力较弱的原因可能会面临较大的债务违约风险。这意味着如果我国向这些国家发起投资或融资项目，势必会使投资风险大幅增加。

3. 文化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是以宗教为主导的社会，在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其中部分国家有很多不为中国企业所了解的文化禁忌，尤其是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伊斯兰教派众多，其意识形态差异较大，在进行对外投资合作的过程中不能一概而论。由于我国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在认识上普遍缺乏对宗教敏感性、宗教习俗的理解，使得这些文化冲突直接增大了境外投资企业的运营成本，对其经济效益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企业内部经营风险

当前我国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项目多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而这些建设普遍存在投入资金巨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风险高的问题，再加上不熟悉国外的商业习惯、

人文环境、法律制度等信息，导致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的过程中对投资环境的综合考量并不充分，增加了企业的风险。对于企业自身来说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主要是投资决策风险、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投资决策风险，主要是指在进行境外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对投资目标地的投资项目、时机等选择不当对企业带来的影响。境外投资决策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盲目决策。二是决策过程失控。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环境和市场需求结构相对复杂，在对境外市场和技术调查不充分的情况下原来有的国内营销策略、管理模式的生搬套用会给企业的经营带来巨大风险。而财务风险主要是指企业的财务管理系统在境外投资因素的干扰下，产生了相应的风险问题，进而波及到境外的投资活动。

三、对外投资风险防范和控制理论

随着当前对外投资战略的调整、深化，我国面向“一带一路”的境外投资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其面临的风险也与日俱增。“一带一路”境外投资风险剧增的现状需要我们更加积极探索适用于“一带一路”境外投资的风险防范方法，来切实提高我国对外投资的风险管理能力，而这些都需要我们从了解和掌握相关的风险管理基础理论入手。

(一) 政治风险理论

关于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的问题，学术界主要是利用技术型手段对境外投资风险进行控制，特别是政治风险的分析和控制，主要以发现政治风险的哪些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一定关系，进而根据影响系数的大小来判断是否需要加以控制。Stefan H. roboak (1971) 在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方面较早的进行了研究，他将政治风险的来源与渠道和对境外投资企业的影响做了关联分析，并构建了一个基本框架。EIU 则从政治风险预警的角度出发，构建了相应的政治风险指数，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了量化分析工具，开创了对外投资政治风险预警的先河（见图 1）。

在此基础上，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从全球化、现代化发展的角度深刻剖析了政治风险、制度风险、人为风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对投资企业和国家而言，由于国际因素、东道国因素等多重因素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控性，因此需要一种符合社会安全稳定发展的新型预警机制。而新型预警机制的建立则需要把握相关风险特征的基础上，在风险界定过程中的价值无涉、风险临界阈值的精确度、对风险认识的反思与责任分摊等方面要有所侧重，进而实现有效预警的目的（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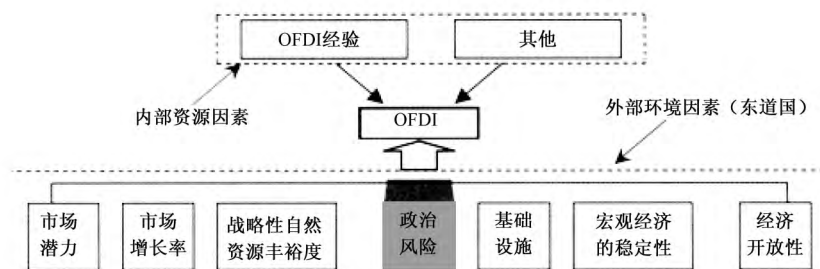


图1 政治风险与 FDI：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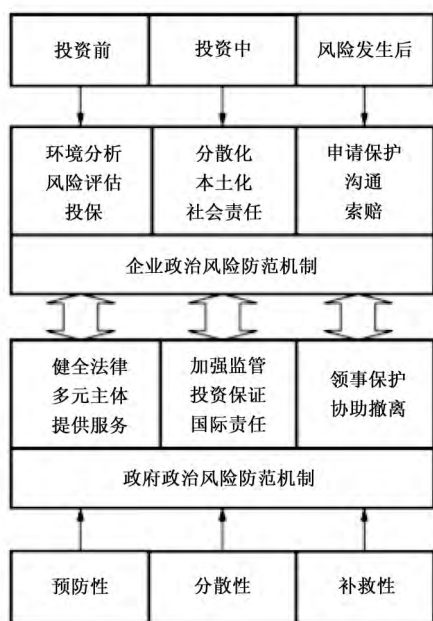


图2 对外投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

（二）现代风险管理理论

随着金融行业和跨国企业的快速成长与扩张，单一风险已不再是构成企业经济风险的唯一要素，而是由汇率风险、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信用风险、文化风险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在这样的时代和历史背景因素的推动下，以风险分散理论等为代表的各类风险管理理论为企业规避风险提供了新思路。

1.风险管理（保险）理论

风险控制理论是 20 世纪初在国际贸易、企业管理等领域的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其后，随着数学概率论、计量分析工具在风险管理领域内的使用，风险管理的相关研究趋于系统化、规范化，并成为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风险管理的主旨在于判断出那些不能够带来有利影响的风险类型，并进行风险分散和转移。在传统风险管理理论中，

Hedges 认为保险可以作为风险管理的一种重要工具来进行风险的化解。因此，保险在风险管理理论的初级发展时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2.分散风险理论

Markowitz 于 1952 年首次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该理论从回报与风险的角度出发，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投资组合的特征，解释了投资者的风险回避行为，并提出了分散风险的投资组合最优方法。因此，R.E.Caves 和 G.V.Stevens 从投资组合理论出发，提出了风险分散理论。R.E.Caves 认为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散投资降低了企业投资收益的相关性，是企业规避投资风险的最佳途径。在进行多元化投资时，由于不同类型资产的风险特征及其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因此需要定期对投资项目进行估计和评价，降低风险的发生。

3.风险对冲理论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信用衍生品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而风险对冲也被广泛应用到信用风险管理中来。风险对冲不仅可以管理系统内风险，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改变系统外风险的发生概率，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压力。因此，风险对冲策略是应对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快捷高效的方法。运营性风险对冲策略和金融性风险对冲策略是风险对冲的主要管理工具。其中，运营性风险对冲策略主要运用于企业的长期战略性管理过程中，提高企业的整体实力，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防范市场风险。金融性对冲策略可以使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利用相关的金融工具来规避企业的汇率风险、利率风险。

4.风险价值理论

由于传统的风险分析理论以资产负债管理作为基础进行分析，缺乏一定的时效性，且资产定价模型的使用过于局限，无法对金融衍生品等新型风险产品进行测度，因此，G30 集团在研究衍生品种的基础上，提出了度量市场风险的 VAR 理论。VAR

理论的主要特征有三个：一是可以简便快捷的表明市场风险的大小；二是可以进行事前风险的计算；三是不仅可以计算单个金融产品的风险，而且对于金融产品组合的风险也可以进行度量。对于企业与金融机构而言，公司既可以通过对冲策略降低风险又可以通过调整财务或组织结构、改变杠杆作用的方式来减少风险的交易成本。

5.文化风险理论

为了拓展风险理论在文化领域的缺失,社会学家结合文化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对风险理论进行了拓展和补充，基于以“人”为中心的新视角、

以文化为基础的文化风险理论。文化风险理论由 Mary Douglas 于 1970 年首次提出，她还创新性的利用“阶层/团体”图式来分析社会问题中的文化因素问题，并形成一种新的风险认知理论——文化风险理论（见图 3）。文化风险理论的“阶层/团体”分析模式对不同的社会角色从定性分析进入到定量分析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实现路径。风险文化理论认为社会人群可以分为四种群体，不同的群体对待风险的意识与态度均不相同，因此，风险决策部门可以根据相应群体的风险行为和对风险控制的偏好来制定相应的风险决策。



图3 “阶层/团体”分析模式

（三）全面风险管理理论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各类企业风险投资的失败，人们发现风险并不是由于某个独立因素引起的，而是以复合的形式存在。因此，风险管理需要从整体性的角度来对所有的风险因素进行综合管理。COSO 委员会适时提出了一个全局性的风险管理框架，旨在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提供完整的风险管理操作流程。COSO 框架将风险管理的概念、内容、特征以及方法列为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该框架将企业风险根据风险管理的目标分为对企业发展战略目标、资源、核心竞争力和企业效益产生重要影响的战略风险，与企业盈利水平变化相关的经营风险，与企业财务活动相关的财务风险以及与使用法律、法规相关的法律性风险等。COSO 框架运用了风险评估、风险偏好、风险内控等量化分析方法为企业进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与控制方面提供了理论。

四、构建全面风险管理治理机制

“一带一路”境外投资风险管理是中国境外投资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构建应符合区域特征，突出管理重点，实施分层管控的管理原则，逐步建立外源性风险治理机制与企业内部风险治理机制并重的体系，不断提升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风险防范与管控能力。

（一）外源性风险治理机制

当前，我国针对“一带一路”的境外投资政策体系尚未建立完善，需在借鉴与吸收欧美国家对外投资管理的经验的同时，给予境外投资的保护与支持，从而防范和控制企业的境外投资风险。

1.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格局

由前文的风险来源可知，战略冲突与政治风险是外部性风险的主要来源，这两类风险不仅给企业带来了经济损失，同时也影响到了中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声誉与形象。因此，政府部门在依靠中国与沿线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及区域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可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谈判与协调，谋取区域内的共同发展，化解潜在政治风险，从而保障与促进我国的境外投资与合作。同时，多边和双边的投资合作协定是我国进行境外投资活动的重要考量依据。通过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协定，不仅可以增强东道国对中国企业的信任 and 安全感，而且可以保证中国境外投资者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此外，针对“一带一路”的境外投资项目，中国应加强对缔结国际公约的认识，熟悉 MIGA 的相关保险机制，善于利用相关公约的条款来减少和规避投资风险。

2.投资综合布局，完善财税金融支撑体系

当前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在跨境投资的经营管

理中还处于初始阶段，且在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项目大多分布在能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投资产业过于集中，市场经营管理经验也严重不足。同时，我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过程中往往受到东道国的诸多限制。因此，首先应在借鉴发达国家的投资经验基础上，采取与境外企业作为主的投资组合、分散产业投资项目或投资目的地以降低经济风险。一方面可以采取股权合作的方式来管控境外投资成本；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应根据当地的生产经营环境等具体情况来制定适合企业在本地发展的本土化经营策略，与当地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其次，我国应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推进人民币海外结算的相关事务，便利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规模的持续提升。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应有步骤的构建相关金融机构支持体系、担保体系以及保险体系，加快国内银行体系与国际银行体系的对接，支持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健全完善企业境外投资财税扶持政策，允许境外企业按照相关规定创新融资方式，增加风险贷款额度，放宽贷款担保机制和外汇限制等，减少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损失。再次，健全境外投资保险制度，构筑“一带一路”境外投资企业保护体系。一个健全高效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有效地分散、转移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风险损失，为投资者提供更充分、有效的资产保护。“一带一路”风险预警系统是对境外投资活动中的风险进行实时评估与监控的重要手段。在风险管理理论的指导下，应对风险因素进行科学的定性、定量分析，按照“理论基础分析—风险指标框架设计—投资风险评估”的流程对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同时，根据风险因子的实际情况及风险管理经验，合理划分出风险的预警区间，判断风险的级别状态，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减低风险。最后，应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监管协调机制的推进，充分发挥各个国家的主权作用，引导相关机构和部门积极参与到协调机制中来，完善对经济风险的防范和预警，促进政治、经济稳定。

3. 重视跨文化理解与沟通，减少对外投资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文化差异巨大，容易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产生误解和摩擦。因此，我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文化危机。第一，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一带一路”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应加强顶层文化设计，积极与沿线国家签订文化合作协定，为国家之间文化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指明发展的主要方向。第二，大力推动沿线

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在现有的文化交流和推广活动的基础上，统筹现有的项目资源，创新文化交流模式，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相互了解，为我国对外投资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第三，我国在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应重视对相关国家的文化分析，能够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被投资国的相关理念，推动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同时还应积极学习欧美国家的对外投资经验，按照国际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我国的对外投资策略，降低风险。

（二）企业内部性风险治理机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较多，因此对外投资企业必须要强化风险管理意识，重视对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改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借鉴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有效提升对外投资风险控制水平，同时还需建立相应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保障海外投资的顺利进行。实践证明，高效的企业内部风险管理不仅可以成为企业顺利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条件，而且还能有效防范与规避境外投资的风险和失误。另一方面还需完善境外投资风险的财务控制流程。财务管理是风险内部控制的核心环节，因此跨境投资企业需要加强对企业的信息系统建设，对企业财务指标进行实时跟踪测度，强化财务人员的独立性和操作规范性，降低境外投资财务风险。

五、结 论

本文在对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境外投资的风险现状、风险类别与表现、风险的相关治理理论以及风险外部性治理与内部性治理等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认识到我国对外投资风险管理能力严重不足的现状。根据我国“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具有国家战略性与追求经济利益的特性、以及沿线国家复杂的经济政治环境和我国企业缺乏跨国经营管理经验的背景，将风险类型划分为外部性环境风险与内部性管理风险两大类。外部性风险主要涵盖了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与文化风险；企业内部管理风险主要为决策风险、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通过对风险社会理论、投资分散理论等理论的分析，本文提出了针对上述风险的分类治理机制，由此为相关的政策建议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本文探索了相关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而且基于“一带一路”的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建议。下一步的研究需要运用风险评估的方法对“一带一路”风险的发生机制以及预警体系的构建做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对风险管理体系是一个有益的补充，还将对境外投资企业的风险管理发挥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 [1] 马昀.“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管控问题[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5,7(4):189-203.
- [2] Robock. Stefan. H. Political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J].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971,7:6-20.
- [3] Richard R. Scott, Attribu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J]. The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1976(3): 277-290.
- [4] Harry Markowitz. Portfolio Selection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52,7(1):77-91.
- [5] Black F. Scholes. M. 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81(3): 637-659.
- [6] Heebert.S. Denenberg, Robert Ferrari, New Perspective on Risk Management: the Search for Principles [J]. 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1966,33(4):647-661.
- [7] Pederson.T. and Petersen.B.. Explaining Increasing Resource Commitment to a Foreign Marke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998,7: 483-501.
- [8] William F. Sharpe. Capital Asset Prices: 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64(3):425-442.
- [9] J.David Cummins: The Risk of Management and the Theory of Firm[J].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1976,43(4):587-609.
- [10] 蒋矩.“一带一路”地缘政治风险的评估与管理 [J]. 国际贸易, 2015(8):21-24.
- [11] 郑蕾, 刘志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J].地理科学进展, 2015(5):563-570.
- [12] 郑钧天.“一带一路”加速中企海外布局“走出去”需防范风险[J]. 中国外资, 2015(13):45-48.
- [13] 王卫星.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风险与挑战[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5(5)上.
- [14] 杨挺, 田云华, 邹赫.2013~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及趋势[J].国际经济合作, 2014(1):25-33.
- [15] 蒋希衡, 程国强.国内外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和建议综述[N].中国经济时报, 2014-08.
- [16] 王东.国外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综述[J].金融发展研究, 2011(2):5.
- [17] 吴向阳. 论我国对外投资的国家干预政策 [J]. 经济体制改革, 2002(5).
- [18] 韩永辉, 邹建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西亚国家贸易合作现状和前景展望[J].国际贸易, 2014(8):21-28.
- [19] 曹旭平, 黄灿, 沈杰.中国对外投资风险防范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 2010(5):147-149.
- [20] 聂名华. 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 [J]. 国际贸易, 2008(10):4-7.
- [21] 保建云.论“一带一路”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创造的投融资机遇、市场条件及风险分布[J].天府新论, 2015(1):112-116.
- [22] 邹嘉岭, 刘春腊, 尹国庆, 唐志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J].地理科学进展, 2015(5):598-605.
- [23] 李琪.中国与中亚创新合作模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缘战略意涵和实践[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43.

China's Risks in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the Preventions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Project

Nie Na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00, China)

Abstract: While bringing in new market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direct overseas invest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would also encounter with certain risks. Through reviewing related literatures on overseas investment 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project, the article categorized the major risks into two types: the external risks and the internal operating risks of the enterprises. External risks refer to political risks, economic risks, and cultural risks; internal operating risks of enterprises refer to decision risks, operating risks, and financial risks. According to above mentioned types of risks, the article reviewed risks management theories, 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risk control measur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overseas investment; risk distribution; risk prevention

(责任编辑：吴 巍)